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二十辑

• 古诗卷 •

學苑出版社

非外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二十辑·古代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二十辑, 古诗卷/赵敏俐

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077 - 5404 - 9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627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01101 (营销部)、010 - 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6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姚苏杰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编 务：马富丽 孙海龙 郝青霄

目 录

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

杜甫研究展望：同相关领域研究一起推进 ◇谢思炜/1

罢官流徙与典范选择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诗学转型 ◇黄小珠/5

文翰双美——唐宋杜诗书法史论要 ◇赵 瑞/18

文本义例视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诗题、题注之复原 ◇李成晴/30

吟诵专题

经典与文读 ◇张本义/45

由《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看中国传统诗文吟诵 ◇刘红霞/58

儒道思想视野下的“唐调吟诵理论” ◇宋振铎/74

华锺彦先生五言格律诗吟诵调研究 ◇刘奶景/84

论文索引与摘要

2014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 ◇孙海龙 整理/98

2014 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硕士论文索引 ◇郝青霄 整理/203

2014 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博士论文

索引及摘要 ◇郝青霄 整理/235

研究综述

20 世纪竟陵派诗歌研究述论 ◇雍繁星/328

钟嵘《诗品》在日本——以其流传和影响为中心 ◇钟卓莹/341

龚自珍与经世思潮研究综述 ◇秦帮兴/355

书 评

杜诗校注谱系中的新善本

——谢思炜先生《杜甫集校注》评述 ◇李成晴/373

唯探本方能求源

——评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 ◇黄 锋/380

深入浅出的新尝试

——评吴振华《唐诗品读》 ◇韩善滨/383

诗入礼制，礼制诗化，诗礼相依，君子已成

——评《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 ◇徐佳超/388

四美具，二难并

——评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 ◇海 滨/394

唐玲《唐庚诗集校注》评 ◇丁 玢/414

会议综述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研究专题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 ◇李 辉/421

日本汉诗研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 /422

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

学术研讨会召开 ◇龙文玲 杨 杰/423

中国王维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424

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唐代文学

学术研讨会召开 ◇胡浩然 郝怡帆 /425

中国古代文学特色文献学术研讨会召开 /426

2016 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黄二宁/428

学人志

刘刚教授 /429

詹福瑞教授 /441

诗歌研究中心动态

诗歌中心 2016 年大事记 /457

2016 年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工作总结报告 ◇赵敏俐/459

主持人语

杜甫研究展望：同相关领域研究一起推进

◇谢思炜^①

杜甫是一个有长久阅读需要的诗人，也是一个可以多方拓展、反复深耕的阅读对象。20 世纪以来，杜甫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例如唐史各领域研究、唐语言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视域和工作基础。试与这以前的研究相比，那时学者往往只能凭一部《资治通鉴》或《新书》来了解唐代历史（《旧唐书》因不流行，很多人都无法参考），对杜诗所涉及的很多历史细节、生活细节心中无数，对文本的理解自然受到很大限制。大型文献如《文苑英华》，旧注家中似乎只有钱谦益曾利用过。《册府元龟》等典籍一般文人更难有机会接触。那时学者也少有比较充分的历史学训练，只能把关注重心放到诗歌作法和风格评析上面，思路狭窄，因循相袭。现在把他们的评论汇集起来看，实在味同嚼蜡，难有启迪。

不过，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下的杜甫研究，至今也已有 80 年以上的历史，专著和研究论文不胜数。和很多同好，尤其是研究生同学聊起来，大家常常会有疑惑是：杜甫研究还有哪些工作可做？还有可能继续深入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此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果给出肯定的回答，让我马上拿出单个的或系列的研究方案或题目，那我是办不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学术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某一领域的研究受制于其他相关领域；同时其意义也取决于它对其他研究的贡献。杜甫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唐史研究和其他文学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当然，它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可望有良好前景，也要看在其中能否有所贡献。就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

^① 谢思炜，1954 年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专长唐宋各体文学研究。

李白出生地的考察，曾对西域史和中西交通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这种相互关联的局面，显然对研究者的学养和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入本期专栏中几篇文章的作者，均在相关研究领域内提出了与杜甫有关的新论题，取得可喜的收获。

就杜甫研究来说，诗人一生经历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安史之乱，整部杜诗与这段历史密切关联。但有关安史之乱本身，至今仍缺少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整个事件过程和各个细部，例如叛军在某一确定时间占据了哪些区域，还缺少准确详尽的说明。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或尚未提出讨论。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对杜诗一些重要作品写作背景和题旨的认定。例如《塞芦子》诗，旧注将其系于至德二年（757），认为该诗是诗人为防备史思明克太原后“横贯而西”，而建议唐军“塞断芦子，预遏敌人西进之路”。但根据现有史料可知，唐军当时已进驻洛交（鄜州），占据长安以北大片区域，根本没有必要退守到芦子关。注家完全忽略了战局发展中双方攻守进退的具体情况，不免陷入逞臆妄说。又如《黄河二首》“黄河北岸海西军”句，钱谦益驳旧注指吐蕃入寇之谬，而引《资治通鉴》“雍王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释之。但《通鉴》胡三省注已注明，河北是陕州属县，与此诗叙事不合。诗中所言“黄河北岸”，更可能是指灵州朔方节度使所在，涉及至德元年阿史那从礼引诱河曲六胡州部落反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往击败之的史实（以上参见拙著《杜甫集校注》）。

近年来，很高兴看到有学者通过对史料和相关地理概念的细致考察，对杜甫举家避乱以至陷贼被解往长安的这段经历再做梳理，并试图对诗人的行踪及意图给出较旧说更为合理的解释。杜甫此时恰好进出于唐军与叛军犬牙相争且朝夕有变的地区，战局复杂。而《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对此只有一些笼统的说明。例如《北征》诗提到的“夜深经战场”，所指究竟是哪场战事？何时发生？规模如何？均无从考究。只有等待更全面的调查，例如从新见唐人墓志等分散材料中尽可能搜集各种局部证据，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弄清与战事有关的更多细节，才有可能对诗人此段经历给出更为稳妥的解释。如果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对安史之乱研究本身无疑也大有裨益。与此类似的，还有诗人生平中的其他一些重要关节。如为何弃官西赴秦州？为何出蜀后不北返而远赴湖湘？诗人在诗中所言以及本传和旧注给出的解释，都比较模糊，或有令人费解之处。在调查更为深入、触及更多历史细

节后，或许对此也会有新的说明。

除此之外，在诗歌艺术分析等方面，由于相关领域文学研究的进展，我们也完全有条件不再拘守于旧的诗歌作法、风格评析等方面。由于杜诗的经典地位，20 世纪以来，人们在谈论有关中西诗学、中外诗学比较的各种问题时，首先被作为引证对象的，往往就是杜甫。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精通各种语言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阅读杜甫，引用杜甫，早已不限于英语、日语等热门语种。例如有学者开始引用希腊语、拉丁语乃至梵语等古典学范畴的诗学经典，与杜甫等中国诗学经典进行比较，就某一诗学问题展开探讨。与汉语有历史渊源的韩语、越南语等，也已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杜诗以它的特殊地位和魅力，在古典诗人中率先进入中外诗学比较领域。这无疑是杜甫研究在新时代的重要推进。我们自然也应当在此视域下，重新审视杜诗的语言艺术成就，以及它所反映的各种诗学问题。

不过，不同语言的诗歌所体现的各自的语言特色，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的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性讨论。对于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不同语言的阅读能力十分重要，只有借此才能直接进入原著，感受原著。我本人的外语很差，很惭愧不能对此提供意见，也无法参与有关讨论。但有一点需要提请注意：仅有语言阅读能力，还不足以应付与语言问题有关的学术讨论，此外还须具有相应的足够的语言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用严谨的语言学概念，进入合乎语言学规范的学术讨论。也确有学者仅凭一些直观的语言感受，在对汉语诗歌与其他语言现象只进行一些匆促比较后，便断言汉语诗歌是“反语法的”。但这样说，其实是对语言学基本常识提出挑战。

19 世纪以来，在西方语言学界和文化界就流行一种“汉语特殊论”，认为汉语“缺少语法范畴及词类乃是绝对的”。而在他们看来，汉语的这种特殊性又来自（或决定）其特殊的“思维模式”。类似论调至今在一些语言文化论者当中还颇为流行，并在谈论中西诗学比较等话题时被轻率地、大量地引用。然而，20 世纪以来，语言学本身的变化巨大而深刻。对汉语及各种语言类型的调查结果，早已扬弃了上述观点。我们再谈论此类话题，必须正视语言学的发展成果，重新筑好论述基础，不能沉湎于一些过时的观念而不自知。在杜甫研究中，我们不妨就以杜诗为样本，进行切实的合乎现代语言学规范的分析，来看看杜诗中是否真的有所谓不合语法的现象，是否确如有些学者所说，

其特殊性就在于与印欧语言定词性、定物位的分析性相对的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等等。如果能认真进行这样的语言学分析，同样也十分有助于我们超越旧时感悟性、印象式的模糊批评方法，将诗歌语言艺术的分析导向更高层次，对前人所谈的各种诗学感受给出更清晰、更有条理性和学术意义的说明。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想法，借《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开设《杜甫研究》专栏之际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7年7月25日于美国马里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编辑：姚苏杰）

（此处为模糊文字，主要内容与上方段落一致，为原文的重复或模糊化处理）

罢官流徙与典范选择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诗学转型

◇黄小珠^①

摘 要：纵观杜甫人生遭遇，他对陶渊明的认识、评价、接受，因其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态度。入蜀之前的罢官经历以及迁徙漂泊的生活遭遇，使得杜甫在相对安适的草堂环境中，在生活行迹上有效效仿陶渊明。与此相应，草堂时期的诗歌创作亦深受陶诗的影响。“遣兴”与“漫与”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诗学追求，创作题材亦转向描写琐细平凡的乡居生活。草堂诗因其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切性和凡俗性成为杜诗创作的一个转型期，反映了唐宋诗歌发展的一个新的走向。

关键词：杜甫；陶渊明；罢官；典范选择；诗学转型

在后人的观念中，杜甫与陶渊明一为忧国忧民的典范，一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②，二者甚少有交集的地方，但实际上杜甫的人生思想及诗歌创作不少受到陶渊明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梳理，^③但尚未能勾勒出杜甫接受陶渊明的具体契机与变化过程。综观杜甫一生，他对陶渊明的认识、评价与接受是随着其生活际遇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对政治失望的罢官经历，在

^① 黄小珠（1983—），女，汉族，福建省漳州市人，现为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② 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③ 比如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之“避俗高士与个性诗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鼻祖”二节（齐鲁书社2002年版）；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之“杜甫及其田园诗与陶渊明”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范洪杰《杜甫对陶渊明的诗学接受》（《北方论丛》，2015年第2期）；刘中文《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学术交流》，2015年第11期）；吴增辉《简论陶、杜田园诗之异同》（《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2期）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多偏于诗歌艺术的比较联系而未详细推究杜甫接受陶渊明的具体变化轨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籍学者阮氏明红《杜甫与陶渊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已注意到“陶杜相似的为官经历与相同的人生价值体验”，但论述失于简略。

杜甫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影响。那么杜甫经历了怎样的罢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有什么样的变化，并对其诗歌创作有何影响？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罢官经历与诗学转型为着眼点，对上述问题加以进一步考察。

一、杜甫的罢官经历及其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

从现存资料来看，杜诗中最早提到陶渊明的是天宝七载（748）在长安所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这是杜甫在长安求官期间，投赠给尚书左丞韦济的干谒诗。在诗中杜甫提到了“隐逸”与陶渊明的话题：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①

“有客”二句巧用河南尹李膺礼贤孔融的典故，借此感谢韦济对自己的垂注之情。“青囊”二句用郭璞得青囊书之事，比喻自己才识卓越而仕途不顺。^②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所谓的“隐逸”并非指断绝仕途的归隐之意，而是借此表达仕途不遇时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仇兆鳌云：“隐逸、西东，伤公之困穷潦倒”。^③ 接下来“浊酒”四句则是对此穷困生活的具体描述。不难看出，这里杜甫效仿陶令饮酒、葛洪炼丹的高蹈行迹，是为了表现自己不同流俗的品格，借此希望获得上位者的汲引，而非真心隐遁。

总的看来，尽管长安期间的杜甫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集校注》，第1页）的辛酸生活，但进入仕途仍是他这一时期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在长安期间他对陶渊明主要停留于表面上的泛泛地征引，实际上无归隐之思。但是在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在长安奔走了八个年头仍一官未得而沦落到与

① 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② “孔融”与“郭璞”的用典出处分别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61页）和〔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9页）。

③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贫民为伍“糴米官仓”，以至他在写给同样穷困潦倒的友人郑广文的《醉时歌》中有“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台。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集校注》，第66页）的激愤之语。杜甫在规劝友人“早赋《归去来》”之际，无疑也意味着对自我仕途抱负的失望，引陶渊明表达对世俗社会的不满。。

接下来从天宝十四载（755）到乾元二年（759）这五年间，杜甫有过两次授官又辞官的经历。在这两次辞官之际，杜甫分别作诗引陶渊明确为行为依据与精神慰藉，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杜甫第一次辞官是在玄宗朝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在长安求官近十年的杜甫被任为河西^①尉。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官职，不久后又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辞去河西尉之际，杜甫作《官定后戏赠》（诗题下杜甫自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抒发心志曰：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杜甫集校注》，第1498页）

在唐代，掌管河西这类县邑的县尉生活是比较辛酸的。^②对杜甫而言，担任河西尉不免要拜迎官长，而“兵曹参军”只是一个闲职，无须折腰奔走。此诗引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旨在说明不任河西尉而就率府旨在取其“逍遥”之意。仇兆鳌注此诗颇能会得杜甫幽衷：“公辞尉而就率府，盖取逍遥自在，得以饮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而为此，故有回首故山之慨。”^③

杜甫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后不久就遭遇了安史之乱，随后他在仓皇逃窜中奔赴唐肃宗凤翔行在，于至德二载（757）五月被任命为左拾遗。然而在左拾遗任上没几天，杜甫就因直言进谏惹怒肃宗，被

① 河西县在何处，历来解释多有歧异。据朱明伦《杜诗“不作河西尉”解》（《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考，杜诗中的“河西县”即今天陕西省合阳县。

② 杜甫的友人高适在封丘尉任上所作的《封丘作》道出县尉的辛酸和无奈：“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参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

③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45页。

“出为华州司功参军”。^①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罢去华州司功参军职，举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关于杜甫此次罢官的原因，《新唐书》解释为：“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② 这固然是事实，然而杜甫弃官的原因却主要是因为对当时政治的失望，他在罢官之际作《立秋后题》云：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杜甫集校注》，第391页）

末句“拘形役”典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③。陶渊明认为求官出仕是以心为形所役使，并非本性所好。杜甫借此典事直率地说出罢官与否是由自身决定的。从“罢官亦由人”一句可知，杜甫此次“罢官”是自我主动的行为，而非被罢免或是“考满罢秩”。^④

据《晋书》记载，陶渊明也有过两次步入仕途、两次罢官的经历。^⑤ 相似的境遇使杜甫很容易联想到陶渊明的处境。从杜甫的人生轨迹来看，这两次辞官促使他真正地在人生思想上接受陶渊明的影响。乾元二年杜甫罢去华州司功参军后不久，在秦州所作的《遣兴五首》其三即借陶渊明事抒发对穷达出处的感慨：

① [宋] 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7页。

② 同上。

③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④ “罢官亦由人”之“罢官”向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杜甫主动辞掉官职，二是杜甫因“荒怠政务”被免除官职。韩成武、韩幅英《解说“罢官亦由人”之“罢官”——对杜甫离开华州任原因的讨论》（《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一文，结合史料辩驳了杜甫并非“荒怠政务”被罢免，乃是主动辞官。笔者赞同韩氏之说。此外，王勋成《杜甫罢官说》（《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则根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提出杜甫考满罢秩说。王氏认为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被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职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正好四年。笔者按：“四考为满”是指在同一官职上四年满任，考杜甫从天宝十四载至乾元二年期间，其官职官阶有三次变迁，即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华州司功参军（从七品下），由此笔者认为王氏所谓的“考满罢秩”说不能成立。

⑤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0—2463页。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集校注》，第447页）

杜甫此诗批评陶渊明“未达道”，曾引起后人的反驳。^①然而，正如宋胡仔引黄庭坚评语曰：“子美困顿于山川，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②此诗表面看似讥讽陶渊明“未必真达道”，实则是借渊明事比喻自身处境。杜甫从自我的处境体察到作为隐者的陶渊明身上的温情：解绶去职并非完全不问世事，归隐还乡亦非完全解脱，为衣食计议、为儿女担忧亦是人之常情所在。可以说杜甫对陶渊明行藏出处之矛盾性的体察，也意味着他对陶渊明思想的进一步认同。

弃华州司功参军之后杜甫辗转秦州、同谷。乾元二年底杜甫经历了千辛万苦度陇入蜀抵达成都，随后在浣花草堂过上一段相对稳定安适的生活。入蜀之前的罢官经历以及迁徙漂泊的旅程劳顿，使得杜甫在相对安适的草堂环境中，从生活行迹到诗歌创作上都深受陶渊明的影响。以下将以草堂生活和草堂诗为中心，对此问题加以集中考察。

二、以陶渊明为典范的草堂生活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杜甫集校注》，第2844页）是杜甫对蜀中生活的总结。在此期间除了于梓州避乱一年外，杜甫主要寓居在成都草堂。尽管避蜀期间唐王朝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蜀地也不曾太平，但同以往的生活相比，草堂的生活毕竟安适多了。浣花溪畔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俗人情给仓惶奔窜的诗人带来宁静的抚慰，对政治失望的罢官经历以及羁旅漂泊的生涯使杜甫在草堂期间从居住环境、生活行迹、及对人情物理的参悟等方面，都处处流露出学陶的风范。

① 参见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276页。

②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18页。

（一）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

《成都府》是杜甫初到成都时所作，写下了他对成都的印象以及当时的心情。开头“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杜甫集校注》，第553页）活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景翳翳以将入”（《陶渊明集笺注》，第461页），写尽寒冬薄暮的羁旅征程。经历了秦州、同谷的原野萧瑟后看到树木青苍的天府之国，他发出了“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的感叹。这感叹之中隐含着他对这一方新天地的期待。此诗最后以“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作结，自我宽慰的口吻很明显与陶渊明诗“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陶渊明集笺注》，第191页）相呼应。

接下来诗人在这里卜居、建堂、落户。他用诗歌表现这一过程的活动、描写草堂的环境，时时流露出一种桃花源的期待。《卜居》中云：“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杜甫集校注》，第1756页）卜居地的浣花溪畔位于成都郊外，虽不能算是与世隔绝，但却与陶诗“遂与尘事冥”（《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陶渊明集笺注》，第193页）的心愿是一致的。草堂落成后，杜甫写了《堂成》，其中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杜甫集校注》，第1766页）“暂止飞鸟”的意象很明显典自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陶渊明集笺注》，第76页），表现出摆脱尘累、返归淳朴的喜悦心情。

浣花溪畔的优美环境是战乱中难得的安适之所，于是杜甫决定在这里安居下去，终老为农。《春日江村五首》其一曰：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贱生理，漂泊到如今。（《杜甫集校注》，第2097页）

此诗以春日江村农忙之景起兴，回顾自己生平漂泊，故愿于此终老为农。虽然蜀地终非平静，杜甫的入世之心使之不能浑然乐享田园之趣——不难看出，“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含有一种勉强当之、聊以自慰的无奈之感——但毕竟对于刚从烟尘战火仓皇奔逃的诗人而言，草堂从物质到心灵上都为他提供了一个足以安顿的场所，几可等

于“可以避秦时乱”的桃花源。

由之而来，其描述的草堂总带有一股五柳先生的况味，一种桃花源的风致。如《赠蜀僧闻丘师兄》“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杜甫集校注》，第573页）化用陶渊明《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集笺注》，第247页），《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野外贫家远”（《杜甫集校注》，第1870页）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陶渊明集笺注》，第83页），等等。《寒食》一诗最典型地表现了草堂与桃花源的相似性：“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闹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杜甫集校注》，第1831页）浦起龙评此诗云：“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①

（二） 只作披衣惯， 常从漉酒生

《旧唐书》杜甫本传云：“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②撇开史传的正统意识形态不谈，杜甫“与田父野老相狎荡”正是他为人亲切、与民为乐的体现。他确实也写下了一些与田父、野老交往的生活场景：“田翁逼舍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集校注》，第739页），“田父要皆去，邻家闹不违”（《寒食》，《杜甫集校注》，第1831页），“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杜甫集校注》，第1877页），等等。

陶渊明田园诗记录了与邻里交往的生活场景，《隐居二首》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有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集笺注》，第133页）杜甫不仅将草堂描写成与陶渊明相似的隐居环境，而且其生活行迹也时时表现出五柳先生的况味。试看《漫成二首》其一：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杜甫集校注》，第1818页）

①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17页。

② [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5页。